

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逻辑理路

陈进东^{1,2} 吴晓蓉²

(1. 重庆师范大学 人事处, 重庆 401331; 2. 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 重庆 400715)

摘要:乡村振兴是新时代党和国家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途径,关系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地方高校作为区域人才培养的主阵地、知识生产创新的主渠道,服务乡村振兴既是内在要求,更是职责使命。研究指出,探讨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个性、共性内涵,以及历史发展脉络,是理解地方高校“何以要”服务乡村振兴的关键;而探讨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理论依据,以及实践经验,是打开地方高校“何以能”服务乡村振兴大门的钥匙。研究从内生逻辑、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四个维度,明晰了地方高校“何以要”和“何以能”服务乡村振兴的逻辑理路,为地方高校高质量服务乡村振兴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关键词:乡村振兴;地方高校;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

中图分类号:G6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3)04-0045-11

doi:10.19742/j.cnki.50-1164/C.230405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正式提出出来的一项国家战略,是党和国家新时代解决“三农”问题的总抓手,是解决农村发展不充分、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重要途径。乡村振兴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社会、高校等多元力量的广泛支持和共同参与。为发挥高校的作用,教育部制定了《高等学校乡村振兴科技创新行动计划(2018—2022年)》《关于实现巩固拓展教育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等文件,引导广大高校积极投身乡村振兴事业。地方高校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2021年,地方高校的数量已经占到全国普通高校数量的95.72%,它们承担着主要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人才供给的特殊任务,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推进和深入实施,地方高校因其鲜明的“地方性”特征,越来越广泛和深入参与到乡村振兴工作中,成为振兴乡村的一支特殊而重要的力量。

目前,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现象已经引起了国内学者们的关注,并且产出了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总体来看,现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在必要性方面,有的学者从乡村的角度提出乡村振兴需要地方高校培育实用人才,对产业融合发展和专业人才给予支持^[1];也有学者从地方高校

收稿日期:2023-06-05

作者简介:陈进东(1979—),男,重庆师范大学人事处处长,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教育与社会发展。

吴晓蓉(1975—),女,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研究员,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教育基本理论、教育与社会发展。

基金项目:2022年度重庆市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项目“重庆公办普通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路径研究”(K22YG205142);2022年度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交往理论视域下当代思想政治教育范式转换研究”(22SKGH112)。

自身发展的角度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倒逼高校进行教师队伍建设、教学模式调整、办学合作模式的改革^[2];还有学者从地方高校与乡村振兴的关系角度提出,地方高校与乡村振兴共生共荣^[3]。第二,在存在问题方面,有的学者认为,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存在学科专业与乡村需求不匹配、组织化程度低、高校与政府和乡村的协调沟通机制不健全等现实困境^[4];也有的学者根据相关统计数据提出,乡村地区人口接受高等教育比例偏低,学生存在不愿主动到乡村就业等问题^[5]。第三,在路径选择方面,学者们提出了地方高校+村民、企业、平台的不同服务模式^[6]、不同类别高校分类服务的价值取向^[7]、培养新型乡土人才^[8]等不同的路径。这些研究聚焦于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缘由、现状和问题、推进路径等方面,产出了一定成果,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这些研究大多还处于经验层面的总结,缺乏学术性归纳分析。特别是在现有的研究中,学者们大多把研究重点放在探讨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路径上,而鲜有系统性地对地方高校为什么要服务乡村振兴这个逻辑起点问题进行梳理和探讨。这也是当下地方高校还普遍存在“对扶贫的内涵和主体认识不足”^[9],导致一些地方高校把服务乡村振兴当作政府推动下的短期被动行为,使地方高校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基于此,本文聚焦地方高校“何以要”和“何以能”服务乡村振兴这两个根本和源头问题,通过探讨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个性、共性特征,以及历史发展脉络,去理解地方高校“何以要”服务乡村振兴;通过探讨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理论依据,以及经验总结,去打开地方高校“何以能”服务乡村振兴大门。

一、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内生逻辑

内生逻辑,即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内在动力,是地方高校“何以要”服务乡村振兴的内驱力。“地方高校”首先是“高校”,其次是“地方”,既具有所有“高校”的共性特征,也具有“地方”的个性特征。地方高校的共性和个性特征,共同构成了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内生逻辑。这种内生逻辑表明,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行动,根源于地方高校自身履行办学职能和发展的需要,这也是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逻辑起点。

(一) 地方高校办学职能的共性特征,使服务乡村振兴成为一种应然状态

高校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不同职能,便是高校的共性特征。顾明远教授在其主编的《教育大辞典》中,将高校职能定义为:高等学校为适应社会分工与社会发展需要所承担的社会任务。一般认为现代高等学校具有三种职能:培养专门人才,发展科学知识,为社会服务。^[10]除此之外,高等教育学界还普遍认为高校具有“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职能。这些职能,规定了地方高校作为高校所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义务。

第一,人才培养职能助力乡村人力资源扩容。高校人才培养职能,伴随着大学的诞生而确立,并成为高校最主要、最核心的职能。12、13 世纪的中世纪,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法国巴黎大学、英国剑桥和牛津大学等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在欧洲诞生。这些大学成立之初,即以培养专业化的牧师、法官、律师和医生为其办学目的。这些大学,“是教授普遍知识的地方”^[11],通过知识教授培养各类社会所需人才,为社会整体进步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人才起着关键支撑作用。但目前农村专业人才奇缺是乡村振兴面临的最实际和严峻的问题。国家第三次农业普查显示,在全国农业生产经营人员中,只有 1.2% 的人员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而只受过初中或初中以下教育的人员占比达到 91.8%。这样的人才结构显然不能支撑现代化的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的需要。“主要为地方培养人才”,既是高校的职能驱动,也是高等教育法赋予地方高校的责任。地方高校能发挥为所在区域培养人才的主渠道作用,为乡村培养、培训大批懂农业、爱农村的各类人才。

第二,科学研究职能助力乡村产业优化发展。科学研究是高校发展中形成的一项重要职能。1810 年,德国教育大臣洪堡创办柏林大学,在办学中践行“纯科学的研究”观点和“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原

则,推动了科学研究成为高校的第二大职能。19世纪中后期,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首任校长吉尔曼推动大学科研职能由“纯科学”的基础研究扩展到解决现实问题的应用研究领域。自此,高校的科研职能就与社会功用紧密联系起来,在解决现实问题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在其中起着压舱石的重要作用。地方高校的科学研究职能,可以为乡村产业振兴进行科技赋能,推动乡村产业升级和优化发展。地方高校科研职能在乡村区域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助力:一是规划和选择适合区域地理气候环境的产业体系;二是为农植物品种改良、家禽作物病虫害防治等提供科技创新和新技术;三是为农产品加工企业提供设备技术改造和升级,完善农产品一二三产业链;四是为农村全域发展提供智库支持,助力乡村电子商务、全域旅游等新业态的发展。

第三,社会服务职能助力乡村整体风貌提升。高校的社会服务职能,体现了高校与社会之间的更加紧密的联系关系。在19世纪60年代,因美国赠地运动而生的威斯康星大学,明确把社会服务作为大学的重要职能,通过向社会传播知识和直接参与当地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方面咨询服务两种途径开展社会服务。威斯康星大学的做法,推动形成了大学和社会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并被推广到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办学实践中,成为高校的基本职能之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整体风貌提升是归宿。乡村整体风貌提升,既包括乡村场域外显风貌的美化提升,更包括乡村农民内在素质的整体提升。地方高校在乡村场域中履行社会服务职能的过程,也即高校各项职能的综合外化过程。一方面,地方高校作为地方发展的智库,可汇聚专家之智,积极为所在区域乡村外显风貌美化提供切实可行的规划建议。另一方面,地方高校作为区域知识中心,以先进知识传播作为服务的主要内容,可通过为区域农民开设培训班、开展科技农技推广服务、教师学生“三下乡”等多种形式,不断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素养,以期达到农民整体素质提升的目的。

第四,文化传承与创新职能助力乡村铸魂化人。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职能可以说是大学与生俱来的自然职能。这是因为大学从诞生之初所确定的人才培养职能开始,就与语言习得、知识传授等文化要素密不可分。英国教育家阿十比在《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1974年)中,正式提出了大学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职能,他认为,在科技快速发展的今天,大学不仅要培养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所需要的人才,更要保存和传播文化遗产,丰富人类文化。2011年4月,时任党中央书记的胡锦涛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提出将“文化传承与创新”并列为大学的职能之一,这也为高校全面履行大学职能提出了新的遵循。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文化是精神源泉。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乡村文化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个性特征,往往与当地特殊的风俗习惯、语言习得、村规民约等紧密联系,具有强烈的地域性特点。对乡村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既需要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等专业知识基础,也需要有与本土文化长期交融的丰富体验。而这,正是地方高校的优势所在。地方高校有大批本土的专家学者,他们了解地方历史传统,熟悉风俗民情,对地方乡村文化有着感同身受的理解,更有利于参与乡村文化建设,构建和重塑地域特色浓郁的乡村文化。

(二) 地方高校“地方”的个性特征,使服务乡村振兴成为一种特殊情怀

地方高校的个性特征,就体现在“地方”二字上。与任何事物的特性都是该事物内在本质方面的规定一样,地方高校的“地方”是其内在本质方面的规定^[12]。地方高校由地方举办,隶属地方政府管理,办学经费主要靠地方财政拨款,学生来源和毕业生就业去向也大多面向所在地区,办学过程中与地方政府、社会团体、企业等合作频繁。因此,“地方高校应理性分析各自的优劣势,充分发掘其区域优势,进行科学定位,坚定不移地走区域化、特色化发展之路,为赢得机遇,走出困境,加快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13]。地方高校和地方的这种特殊的关系和长久而深刻的交流互动,使地方高校产生了对地方的归属感、依赖感和参与交融感,也使“地方”对地方高校具有了特别的意义和情怀。

首先,地方高校“地缘贴近乡村”的特点,使其在服务乡村振兴时具有先天的地域优势和情感基础。从地方高校的地理分布情况看,全国大中小城市均有分布,且有相当数量的地方高校在地、市一级的中

小城市办学。这样的高等教育布局,使地方高校更能全面了解、掌握所在地区的发展状况,直接感受到所在地区社会经济的变化情况,有利于地方高校与地方的深度融合。同时,地方高校一般都具有较长的扎根当地的办学历史,其教职工和培养的学生大多来自本地区,他们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有着特殊的情感和更多的感性认识,更容易理解和深入参与当地的乡村振兴工作。

其次,地方高校“发展依赖地方”的特点,使其在办学中必须以地方需求为导向。地方高校的正常运行和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地方政府的投入。地方高校要获得更多的地方政府投入,就必须以地方需求为导向,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与地方政府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纵观全国地方高校的年度财务预算情况,绝大多数地方高校的财政公共预算拨款,在其年度财务预算中的占比都超过50%以上。这意味着,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的投入和支持,这些高校的运行和发展就会陷入困境。乡村振兴战略是国家战略,各级地方政府必须坚决抓好贯彻和落实。各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要求下,积极落实本区域乡村振兴战略目标,规划中长期发展战略,科学分配区域资源,推动和督促各职能部门落实行动计划。^[14]地方高校要顺势而为,主动发挥自身的科技人才优势,参与乡村振兴工作,为乡村建设贡献力量,从而体现地方高校的价值和意义。

第三,地方高校“办学面向地方”的特点,使其需要把乡村作为服务面向的战场。地方高校办学面向地方既包括人才培养主要面向地方,也包括科学研究主要面向地方。地方高校培养的各类人才主要服务地方发展。以重庆市的几所地方高校为例: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2020届毕业生共4638人(全为专科生),其中85.02%的毕业生选择在重庆市内工作;重庆文理学院2020届毕业生共5204人(全为本科生),其中66.34%的毕业生选择在重庆市内工作;重庆师范大学2020届毕业生共7249人(研究生923人,本科生6326人),其中66.36%的研究生和63.45%的本科生选择在重庆市内工作(数据来源于相关高校官网2020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这些毕业生从业于各行各业,工作地点既有城市,也有乡村,都在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和智慧。科研方面,地方高校受管理体制、经费投入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大多存在研究能力薄弱的问题,缺乏足够的能力进行高尖精的科学研究。因此,地方高校开展科学研究的方向一定是紧密结合地方需要做研究,在服务地方中形成特色和优势。乡村为地方高校的科学研究提供了广袤的天地。地方高校要紧密结合所在区域乡村的产业升级、技术创新等开展科学研究,把论文写在乡村的大地上。

二、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历史逻辑

历史逻辑,即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历史渊源,是地方高校“何以要”服务乡村振兴的历史观照。法国著名学者涂尔干在论述学校这个特殊的机构时提出:“这些机构有它们的过去,过去是培育它们的土壤,赋予它们现在的意义,脱开过去对它们进行考察,势必会出现大量简单化的理解甚至曲解”。^[15]因此,对于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行为,也绝不能仅从当前的现象看现象,而需要从高校和乡村的历史互动中寻求答案。从历史进程看,我国现代意义的大学自创立起,就开始了主动探索通向乡村的路径。这些探索和做法的历史逻辑说明,高校服务乡村具有悠久的历史,并留下了珍贵的积淀和印记。地方高校服务乡村建设,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将是高等教育自觉担负历史使命的重要途径。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地方高校聚焦高等农业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服务乡村

我国具有现代意义的近代大学最早出现于19世纪末期。这个时期的大学,受清末“西学东渐”浪潮的影响,模式、学制、体例等基本仿效西方高等教育,其中尤以美国的高等教育模式、办学理念影响最盛。正是受美国高等教育的社会服务功能、平民主义等教育思想的影响,这一时期的高等教育服务乡村,主要聚焦于高等农业教育服务乡村和乡村建设运动两个方面。需要说明的是,当时虽然有国立、省立、私立(教会)大学之分,但基本上实行的是校长负责制,校长有很强的办学自主权,因此,各类高校并

无严格的层次和服务面向划分。

受美国赠地运动而生的美国州立农业院校服务乡村农业的启示和影响,我国的农业院校率先开始了高校服务乡村农业的本土化探索。进行探索的农业院校,既有省立的地方大学,也有国立大学。首先,这些农业院校通过创设农业科研机构,研究解决农业生产、农作物改良和病虫害防治等农业方面的实际问题,为农村农业提供技术推广和技术服务。据载,至1947年,国立和私立农科院校设有农科研究所15家^[16]。它们致力于解决农业及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对当时的农作物品种改良、作物病虫害防治等起到了较好的推动作用。其次,这些院校通过为农村农业培养专门人才和推广师资服务乡村。一方面,农科院校致力于直接培养农村农业需要的实用人才、行政人才、研究人才、中学农业教员、农科大学教师等专门人才;另一方面,农科院校还通过设立专门系科,培养农业推广师资。1924年,金陵大学设立农林科乡村教育系。随后,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湖北教育学院、福建协和大学农学院等院校先后创办农业教育系,培养具有农业专门知识的农业推广教师。第三,这些农业院校还通过各种形式的技术推广,提高乡村农民的养殖种植技术。这些形式主要包括:举办短期农民训练班,招收乡村农民,对其进行专门的农业技术培训;编印通俗易懂的农业技术科普书刊,利用广播等宣传介绍农业基本知识等。

乡村建设运动是这一时期高校服务乡村的特殊形式。之所以说是一种特殊形式,是因为其开展的扫盲、农业基础知识教育、卫生常识教育等活动看似与高校没有关系,但“无论从目的、内容,还是从参与者特点和意义上讲,乡村教育运动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都能为高等教育通向农村提供多方面的启示”^[17]。这一时期的乡村建设试验遍及全国,到1935年,就有193处之多,其中著名的有: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定县的试验,山东乡建研究院在邹平的试验,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徐公桥的试验,燕京大学在清河的试验等。乡村建设运动通过提高农民的“知识力”“生产力”“健强力”和“团结力”,力图达到改变农民、改造农村,促进农村发展,进而最终促进国家强盛的目的。整体而言,乡村建设运动包括了文化、教育、农业、经济、卫生,以及特定条件下的自卫等各个方面的工作。在文化教育方面,强调要“以全体村民为教育的对象;以整个乡村为教育的场所;以民族再造与建设乡村为教育的目标;以适应实际生活、改良实际生活、创造实际生活为教育内容……以家庭、学校、社会合一之综合方式为施教的方式”^[18]。在农业方面,要促进品种改良,推广科学的生产方法。在经济方面,以“合作社”的新的经济组织的方式,实现农产品产、运、销的一条龙链条。在卫生方面,实行保健制度,村设保健员,联村设保健所,县设保健院,提高农民健康保障能力。此外,政治、交通、自卫等方面,乡村建设运动均有所涉及,并取得了不同成效。乡村建设运动对大学教育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南开、燕京、清华、金陵等大学,均积极参与农村建设运动,在农村建立试验区供学生实地研究。大学中的专家学者、学生,更是掀起了离城下乡的热潮,广大知识分子纷纷投身乡村建设实践。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地方高校逐渐形成全员全方位参与乡村建设的格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到改革开放之前的一段时间,我国高等教育整体上处于“破”“立”并举的阶段。这一时期,不管是中央部门管理的高校,还是地方政府管理的高校,在曲折前行中,也开展了一些服务乡村的工作。比如,部分省市尝试创办农业业余高校,培养农业生产急需人才。1958年,吉林省创办了我国第一所农业业余大学——黎明业余大学,为当地农村农业发展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在1964年下半年党中央国务院掀起半工半读高潮时,“农业部决定7所高等农科院校为半工半读的技术学校培训师资;卫生部决定高等医学院校要到农村办学,多数专科学校逐步办到县或县以下农村……据1965年下半年统计,全国半工半读学校已达4000多所,学生80多万人”^[19]。需要说明的是,农业部于2018年更名为农业农村部,卫生部于2013年更名为国家卫计委,2018年更名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改革开放以后,高等教育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到1998年,基本形成了中央和地方分级办学的高等教育体系,地方高校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为配合党和国家对农村建设的要求,

1995年,国家教委颁布《关于深入推进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意见》,提出要广泛地组织高等院校参与农村教育综合改革,进一步探索高等院校面向农村的路子,推动农村经济、科技、教育的发展^[20]。2003年,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明确要求:“高等学校……要积极开发和推广农业实用技术和科研成果;支持乡镇企业的技术改造和产品更新换代;帮助农村职业学校和中小学培养师资。”^[21]在党中央国务院和教育部的政策推动下,地方高校开始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通过培养培训农业技术人才、农村教育师资,选派科技副县长、副乡长,开展与农业相关的科研等方式参与农村建设。这一时期的地方高校服务乡村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更多是农林类和师范类地方高校按照政府安排和部署参与了乡村建设。就地方高校整体而言,无论是参与的深度还是广度都还不够。

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随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指导这一时期农村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要求“各行各业都要关心支持新农村建设,为新农村建设作出贡献”。为此,2006年12月,时任教育部部长周济在河北主持召开“高等学校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座谈会”,要求高校从科研、人才培养等方面积极主动投身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通过培养培训“三农”专门人才、实用人才和新农村建设的带头人,开展农民素质培训和乡风文明建设等,为新农村文化建设服务^[22]。随后,教育部等部委相继印发《关于推进高等农林教育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深入开展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创业行动的意见》《关于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的意见》《关于开展高等学校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建设工作的通知》等一系列文件,从制度设计上推动了高校与乡村更加紧密的联系。在这一时期,地方高校也逐步形成以涉农高校为主体,其他高校为补充的整体服务格局,广大地方高校积极参与新农村建设,在一定程度上辐射带动了农村的建设和发展。

2012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作出了在全国范围打响脱贫攻坚战的整体部署。脱贫攻坚,农村是主战场!高校在这场战斗中,主动参与,积极作为,体现了新时代社会主义高校的责任和担当。2012年以来,教育部75所直属高校尽锐出战,全面投入脱贫攻坚战,成为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一支重要力量,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成效显著的高校扶贫道路^[23]。地方高校积极响应,通过人才培养、产业对接等途径,汇聚学校人才、学科、科研成果等优势资源,精准服务贫困乡村,并探索形成了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扶贫路径。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正式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无缝衔接,并成为新时期国家振兴乡村的最新制度性战略安排。各地方高校在教育部和地方政府的引导、要求下,纷纷延续前期参与脱贫攻坚好的机制和做法,更加广泛和深入地参与到乡村振兴工作中。

三、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

理论逻辑,即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思想源泉,是地方高校“何以能”服务乡村振兴的理论依据。列宁有一句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意指工人运动要有工人运动的理论指导才能取得实效,这对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需要理论指导同样具有意义。在纷繁众多的各种理论中,马克思主义乡村发展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和三螺旋模式为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的思想和实践理论依据。

(一) 马克思主义乡村发展理论为高校服务乡村振兴提供了思想理论依据

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高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高校,马克思主义是我国高校办学过程中必须坚持的基本理论,这是中国高校的鲜亮底色。作为我国高校办学依据和宗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国家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遵循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发展社会主义的高等教育事业。马克思主义乡村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组成

部分,为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提供了理论指导,是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重要思想源泉。

马克思、恩格斯将农业定位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最“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产业。他们认为农业是关乎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问题,“农业劳动是其他一切劳动得以独立存在的自然基础和前提”^[24]。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推动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更多的人力、资金、技术集聚到城市,使乡村在与城市的竞争中处于逆势,沦为城市的附属。“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25]。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城乡差距日益拉大,乡村对立日益严重,城市的生产资料越来越集中,财富越来越集中,而农村越来越贫穷,越来越落后。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展乡村以消灭城乡对立日益成为社会整体进步的要求。对于怎么样发展乡村,消灭城乡对立,马克思、恩格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中,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即通过工农结合的方式,促进生产资料的流动,从而逐步消灭城乡对立。

马克思、恩格斯眼中的乡村发展和消除城乡对立之间具有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乡村发展是“因”,消除城乡对立是“果”。乡村发展的关键是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乡村衰落、城乡差距拉大,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要解决这个问题,也还得依靠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特别是乡村的生产力的方式解决,通过生产力发展使乡村获得更多发展的物质基础,从而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要发展乡村,消除城乡对立,就必须改变生产关系,即废除私有制,建立公有制。马克思认为,“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26],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而社会主义的本质是通过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对立,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生产资料从个体占有到社会占有的转变,从而改变人被生产资料奴役的情况。

马克思主义乡村发展的理论,深刻揭示了乡村发展和城乡关系的本质特征,为我国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提供了思想源泉,奠定了基本理论指导。根据马克思主义乡村发展的理论,要发展乡村,消灭城乡对立,就必须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特别是发展乡村生产力。乡村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大量农业农村专门人才,需要农业科技创新,需要壮大农村集体经济,需要构建向善向上的乡村文化。而这些也正是地方高校在履行办学职能的过程中,所能提供服务的巨大舞台。

(二)人力资本理论和三螺旋模式为高校服务乡村振兴提供了实践理论指导

1. 人力资本理论启示高校服务乡村振兴要充分发挥人才培养职能

所谓人力资本,指的是通过投资活动而在人自身中形成的各种生产知识与技能的存量总和^[27]。人力资本的概念和思想虽然从17世纪60年代即开始被经济学家关注,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成为一种理论并被系统发展和广泛应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T. w. schultz)在人力资本理论的建构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提出的关于人力资本是促进国民经济增长主要因素的论断,被公认为标志着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诞生。

舒尔茨主要从经济发展特别是农业发展的角度来研究人力资本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农民贫困和农业落后,根本原因是农业人口的质量不高。农业人口质量的提高,关键在于通过投资而形成人力资本。舒尔茨非常强调在人力资本形成的过程中,投资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他提出对人力资本投资主要有五种形式:一是保健投资,指为了延长生命,对增强个体精力和健康等方面进行的投资;二是职业培训,指为提升企业员工的技能而进行的各种培训活动;三是教育投资,指接受正规的小学、中学和高等学校教育;四是技术培训,指为推广某种技术而进行的专门培训;五是人力迁移,指个人或家庭为获取更多的收入而进行的迁移活动。他特别对1929—1957年美国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作了定量研究,发现各级教育投资的平均收益率为17%,教育投资增长的收益占劳动收入增长的比重为70%,教育投资增长的收益占国民收入增长的比重为33%^[28]。由此得出结论,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远远高于物资投资回报率等其他投资回报率。而教育投资又是人力资本投资的最主要内容。

根据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在乡村经济发展中,乡村人口质量的提高对于乡村振兴起着关键的作用。提升乡村人口质量,势必对乡村人口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而在各项投资中,教育投资是回报率最高,也是最有效的途径。地方高校的基本职能之一就是人才培养。地方高校通过为乡村培养农林、教师、经济、管理等各级各类专门人才,利用地缘优势开展新型农民的职业培训、技能培训等,增加了乡村人口及乡村各级各类人员的人力资本,这是地方高校在服务乡村振兴中的核心要义和重要抓手。

2. 三螺旋模式启示高校服务乡村振兴要大学、产业、政府三者联动

三螺旋模式是一种创新模式,由美国学者埃茨科维兹(Henry Etzkowitz)创立,指大学、产业、政府三方,分别以独立的身份,通过合作和相互作用,推动区域创新进程。在三螺旋模式中:产业作为进行生产的场所;政府作为契约关系的来源,并确保稳定的相互作用与交换;大学则作为新知识新技术的来源,是知识经济的生产力要素^[29]。通过大学、产业、政府的三者联动,推动创新活动深入开展,使大学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埃茨科维兹认为,区域经济要得到创新发展,就必须要强化大学、产业和政府之间的三螺旋循环上升关系,进而在三螺旋模式中提出了区域三螺旋空间的概念,这对指导高校服务乡村振兴具有极强的实践意义。区域三螺旋空间由一系列知识空间、趋同空间、创新空间构成,这些空间彼此交叉,互为重叠。知识空间指大学或研究机构针对区域发展中某个特殊问题的研究资源和知识的总和。这些知识只有达到一定的总量才能形成生产力,从而促进区域发展。趋同空间指来自大学、产业、政府等方面的不同人员在一起讨论制定区域发展的战略规划、创新项目和行动计划,并达成一致的过程。趋同空间让大学、产业和政府具有共同的愿景,使区域发展过程中,充分整合三方资源成为可能。创新空间的任务是为趋同空间确立的战略目标实施,创造一种适切的组织和保障机制。区域三螺旋空间的一系列知识空间、趋同空间和创新空间要素被集聚到一起,就能对区域发展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当今是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对于社会而言具有了更加特殊的作用和意义。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区域知识生产和传承主体的地方高校,与政府、产业之间的联系也必将越来越紧密,也使三螺旋模式具有了无限的可能空间。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实际就是区域三螺旋空间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过程。地方高校作为区域产业和技术创新的主要源泉,其在乡村这个场域中,针对乡村发展给予技术开发和知识的供给,从而形成知识空间;地方高校、乡村发展相关产业和乡村所在各级政府一起,共同以地方高校知识为基础,研讨并形成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和实施步骤,从而形成趋同空间;最后,地方高校、产业和政府为共同制定的乡村发展规划、计划,创立组织机制,保障乡村发展规划顺利实施,从而形成创新空间。三个空间集成在一起成为推动乡村发展的源泉和动力。

四、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实践逻辑

实践逻辑,即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现实状况,是地方高校“何以能”服务乡村振兴的实践阐释。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是振兴乡村的一体两面,不同阶段。广大地方高校在脱贫攻坚阶段积极作为,形成了诸多各具特色的服务乡村建设的路径和经验。这些实践路径和经验,在乡村振兴阶段同样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一)“教育扶智”成为广大地方高校的实践共识

按照人力资本理论,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乡村人口质量的提高。提高乡村人口质量,教育是最持久、最有效的手段。各地方高校参与脱贫攻坚以来,紧紧围绕提高乡村人口质量这个“牛鼻子”,以“扶智”为核心开展了诸多扶贫实践,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是为农村贫困学生提供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一方面,广大地方高校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地方有关招生的倾斜政策精神,单列国家、地方和高校“三大专项计划”面向农村和贫困地区招生,优先

录取建档立卡家庭贫困生等,让更多的农村贫困学生能进入大学学习。另一方面,各地方高校也主动思考和探索农村学生考取大学的途径,比如南京农业大学对帮扶地中学生实施“禾苗助学成长计划”,通过开展学业指导和规划、实践游学等,助力更多农村学生考上大学。园艺学院与黔东南州最高学府凯里学院联合培养研究生,助力高层次人才培养。“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教育部综合施策下,累计有 514.05 万名建档立卡贫困学生接受高等教育,数以百万计的贫困家庭有了第一代大学生”^[30]。这为越来越多的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获得优质教育资源提供了可能,同时也打通了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向城市纵向流动的路径。

二是为乡村直接培养各类高质量的专业人才。不同类型的地方高校在为乡村振兴培养专业人才的过程中进行了不尽相同的实践。目前,地方师范类高校、涉农类高校、医科类高校和职业院校已成为乡村专业人才的主要供给力量。地方师范类高校是乡村基础教育师资的主要供给力量,通过实施全科教师计划(有的省市又称“公费师范生培养计划”等)、“特岗计划”“支教计划”、参与西部计划等形式,为所在区域乡村基础教育输送大量一专多能的优秀师资。地方涉农类高校是农村农业专门人才的主要供给力量,通过建设新农科、推进田间地头实践和农业力量结合,培养大批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专业队伍。地方医科类高校是乡村医疗人才的主要供给力量,通过实施全科医生特岗和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等计划,为健康乡村建设提供医疗人才保障。职业院校是乡村职业技术技能人才的主要供给力量,通过农村产业订单式培养、职业农民培训等,为乡村振兴培养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农村高技能人才和新型职业农民。

三是为乡村发展培训各类专业和管理人才。乡村人力资本的储备,不仅靠外来人力资本的输入,更要靠提升乡村固有群体的综合素质来实现。各类地方高校在教育扶贫的实践中,根据自身的优势和特点,针对乡村不同的群体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技能培训,形成了乡村干部治理能力提升培训、乡村基础教育师资培训、乡村医疗人员培训、职业农民产业技术培训等培训品牌,切实提高了乡村各类专业人才的专业素能。同时,各类地方高校还坚持自身教育优势与帮扶地区需求相结合的思路,形成了特色帮扶模式。比如,合肥工业大学与帮扶地安徽灵璧县在县域合作共建合肥工业大学技师学院灵璧分院,为当地培养了大批技能型人才。湖南师范大学充分利用基础教育优势资源,面向贫困地区开展基础教育合作办学,无偿输出优质教育资源,援建的多所县市区中学成为省示范性高中,为区域基础教育师资能力提升作出了应有贡献。

(二)“科技赋能”成为广大地方高校服务乡村的有效途径

按照三螺旋模式理论,地方高校在乡村场域,可以充分发挥知识生产者的核心作用,与乡村产业、地方政府形成区域三螺旋空间,共同推动乡村区域发展。这本质上是地方高校利用自身的知识优势,对乡村发展给予技术开发和知识供给,从而推动产业升级和技术迭代更新,促进乡村建设。在此模式指导下,也形成了诸多可推广可复制的实践样态。

一是利用创新元素培育新产业发展新业态。脱贫攻坚以来,“各高校通过发挥学科优势,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和产业化,助推种养业、手工业、农产品加工业等传统产业发展升级,培育发展乡村旅游、中草药、民族文化用品、民族传统技艺等特色产业,形成经济发展新业态,助推脱贫攻坚和农民增收”^[31]。各地方高校将学科优势转换为服务乡村的动能,一方面将符合乡村发展需要的现有科研成果进行转化,推动产业生产力发展;另一方面,根据乡村发展的需要,积极联合当地政府共同申报科技项目,针对乡村所需所想,聚焦解决当地的产业技术问题,培育、发展适切的新业态,从而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帮扶模式。同时,地方高校依托一线办学的地域优势,还形成了相关科研平台,科技人员长期驻扎乡村,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的工作模式,实现了地方高校科技赋能的“零距离”。

二是利用智库推动产业发展科学规划。智库是地方高校科技赋能乡村发展的特殊形式。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地方高校结合乡村所在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围绕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旅游规划、生态保

护开发、乡村治理优化等,组织专家学者开展调研、论证和研究,为乡村所在地党委、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和政策建议。有的地方高校专门成立乡村振兴研究院,针对对口帮扶的乡村开展深入的研究,帮助乡村制定一段时期的发展规划,加强环境、文化、产业、基础治理等全方位的指导,助力乡村振兴。有的地方高校拨付专项资金常态化设立科研项目,调动校内专家围绕乡村振兴过程中的热点、难点问题提供智力服务。

三是构建了以产业需求为导向的“高校+企业+政府”的服务模式。针对地方高校科研转化能力不足的问题,广大地方高校探索构建了“高校+企业+政府”共同体服务乡村的模式,通过校企、校地合作,在推进乡村产业发展中,实现高校、企业、政府的融合和共治,三方共同参与乡村产业规划与设计、产业融入与发展、产业升级与创新。比如,沈阳农业大学就与辽宁省内外15个市(县、区)、1200多家涉农企业进行产学研合作,全面打造乡村振兴综合示范县,取得了良好效果^[32]。在共同体服务模式中,地方高校的创新资源和智力资源能得到更有针对性的汇聚和激发,有效促进科研成果转化为乡村产业发展的生产力,从而提高科技创新效能,推动乡村产业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系统工程,长期复杂而艰巨。乡村振兴的实现,需要得到社会各方力量的共同参与,共同推进。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既是由其高校身份所具有的办学职能所决定的,也是由其“地方”身份和服务面向的内涵所规定的,是地方高校履行办学职能和自身建设发展所需,由内而外所产生的一种办学行为^[33]。同时,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都已经为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提供了充分的准备。地方高校作为“地方”的大学,应把参与和服务乡村振兴,作为体现自身存在意义和价值的重要方式和途径,把乡村作为学校工作的重要战场,实实在在为乡村振兴贡献地方高校之力。

[参 考 文 献]

- [1] 韩嵩,张宝歌. 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路径探析:以辽宁省为例[J]. 河北农业大学学报(农林教育版),2018(10):116-120.
- [2] 翁鸣,张静. 乡村振兴战略促进高校改革发展[J]. 中国高等教育,2020(4):27-29.
- [3] 徐莉. 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教育振兴模式及其路径探索[J]. 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2(5):51-57.
- [4] 周能寿,张付安. 从互动到共生:地方农林院校服务乡村振兴的困境与突破[J]. 教育评论,2022(8):28-34.
- [5] 闵琴琴. 农村高等教育扶贫:缘起、困境和突围[J]. 高等教育研究,2018(5):24-31.
- [6] 黄巨臣,焦晨东. 地方高校参与乡村振兴的“多重嵌入”路径[J].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22(11):60-67.
- [7] 李才. 高等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路径分析[J]. 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1):91-97.
- [8] 许纯洁. 民族地区高校新型乡土人才培养:时代使命与实现路径[J]. 广西民族研究,2019(2):90-95.
- [9] 苏芳,刘钰,李彬. 后脱贫时代教育扶贫长效机制构建的探讨[J].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182-187.
- [10] 顾明远. 教育大辞典[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 [11] 约翰·亨利·纽曼. 大学的理念[M]. 高师宁,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 [12] 韩颖,杨天平. 地方高校之“地方”探究:高等教育分类的国际视角[J]. 比较教育研究,2020(8):49-56.
- [13] 韩建敏. 区域意识与高校发展:关于地方高校办学特色及发展模式的思考[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106-108.
- [14] 吴思斌. 乡村振兴需多元力量共同参与[J]. 人民论坛,2018(11):72-73.
- [15] 涂尔干. 教育思想的演进[M]. 李康,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 [16] 教育部教育年鉴编撰委员会.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48.
- [17] 潘懋元. 中国高等教育百年[M].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 [18] 晏阳初. 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 [19] 董孟怀,等. 百年教育回眸[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 [20] 国家教委关于深入推进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意见[J]. 北京成人教育. 1995(9):19-21.
- [21]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EB/OL]. http://www.moe.gov.cn/jyb_xxgk/gk_gbgg/moe_0/moe_9/moe_38/tnull_89.html.
- [22] 唐景莉,杨占苍. 高校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座谈会在河北召开[N]. 中国教育报,2006-12-03.
- [23] 介绍教育部直属高校扶贫工作进展及成效[EB/OL]. http://www.moe.gov.cn/fbh/live/2020/52663/twwd/202011/t20201126_501833.html
-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2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7] 张凤林. 人力资本理论及其应用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6.
- [28] 甘小霞. 我国行业收入差距实证研究[D]. 浙江大学. 2010.
- [29] 亨利·埃茨科维兹. 三螺旋[M]. 周春彦.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 [30] 梁丹,董鲁皖龙. 抒写教育脱贫攻坚的伟大史诗:全国教育系统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纪实[N]. 中国教育报,2021-02-26.
- [31] 教育扶贫:补短板开良方形成六大“高校品牌”特色扶贫路径[EB/O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fbh/moe_2606/2019/tqh_201910151/mtbd/201911/t20191107_407329.html.
- [32] 刘广林. 牢记使命全面服务乡村振兴[EB/O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zt/moe_357/jjyzt_2022/2022_zt04/dongtai/bitian/202210/t20221012_669142.html.
- [33] 梁静,杨如安. “优师计划”培养路径研究[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3(1):60-67.

The Logic Lines of Local Universities Serv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Chen Jindong^{1,2} Wu Xiaorong²

(1. Personnel Division,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2. Faculty of Educ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an important approach for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to resolve issues relating to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in the new era and realize the coordinating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which is closely linked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dream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As the main position of regional talent training and the main channel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innovation, local universities are intrinsically required to serve rural revitalization as well as their duty and mission.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core to understand why local universities should serve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common connotation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it. While the discussion on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local universities serv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the key to understand how can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erve rur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this, the study clarifies the logic line of why should and how can local universities serve rural revitalization from four different dimensions, including endogenous logic, historical logic,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logic, thus providing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local colleges to serve rural revitalization with high quality.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local universities; historical logic; theoretical logic; practical logic

[责任编辑:陈忻]